

我認識的楊振寧先生

徐立之

我與楊振寧先生的交情不算深，但他給我的印象卻不淺。

楊先生雙目炯炯有神，說話語簡意賅，還有我最佩服的是他的記性特強。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92年美國費城的富蘭克林研究所科學博物館 (Franklin Institute Science Museum)。當年，研究所給了我一個艾略特·克雷松獎章 (Elliott Cresson Medal)，嘉許我發現囊腫纖維症遺傳基因的工作。我是唯一的獲獎人，是楊先生提名的；這個獎在1848年成立，不定期頒發，1998年歸入本傑明·富蘭克林獎 (Benjamin Franklin Award)。在268個克雷松獎章獲獎人中，我是唯一的華人，一定要感謝楊先生對我工作的認可。

大家都知道楊先生是一位物理學家，但在頒獎典禮後，他於博物館為我的演講作介紹，他對我的工作比任何一位生物或人類遺傳學家，甚至比我自己都解析得清楚。還有，他的致詞從來都不是唸稿的！

之後，我有機會聽楊先生作公開的科學普及講課。他那一次課堂的題目是富勒烯 (Fullerene) ——一種完全由碳組成、形狀呈球形的中空分子；這結構與我博士研究题目的噬菌體 (bacteriophage) 的個體粒子相似，所以印象特別深刻。楊先生的講演由淺入深，解釋這碳分子的構造和可應用的特性；雖然我無法記憶詳細內容，但記得聽眾的反應是十分熱烈的；在他回答問題時，總是簡短到題。我頓時感到楊先生雖然是研究理論物理的泰斗，但他對化學分子的認識是何等深入！楊先生博學多聞，真是令我五體投地！

有一次我去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會議，在飛機上遇到楊先生與其妻子翁帆女士，他們比我晚登機，但楊先生一進機艙就立刻看到我，我還來不及站起來，他已經走過來跟我打招呼。在院士會議開幕式時，我被安排坐在他的後一排正後方，攝影機在他前面不停地「咔嚓」，真是與有榮焉！可惜我從來沒有看過那些照片。

在我的照片收藏裏，只有一張在2016年邵逸夫獎頒獎典禮上與楊先生的合照。說起邵逸夫獎，那是邵逸夫爵士於2002年創立的，楊先生與已故的邵方逸華女士和馬臨教授是邵逸夫獎理事會的三位始創成員。今天，邵逸夫獎已是一個眾所皆知、全球性的重要科學獎項之一，表彰在科學學術研究上取得「對人類生活產生深遠影響」的成果的科學家，很多人稱之為「東方諾貝爾獎」。楊先生在其中的貢獻，不能量計。

2015年，香港科學院正式成立，目的是推動香港科技發展，提升香港科研實力，使香港成為亞洲科研中心。我們的工作包括：推動香港科技前進及發展、推進香港的科技教育和組織科學普及活動，以增進大眾對科技的認識與興趣。我們邀請楊先生當榮譽院士，他立刻接受，令香港科學院生色不少！

自2016年以來，團結香港基金會在香港舉辦創科博覽，楊先生是這項大型活動的名譽顧問，他對這項活動十分支持；在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之前，楊先生每年都親自到場並致詞。他寄語香港年輕人，能夠成長在這個科技高速改變人類的時代、生於中國能夠全力追趕尖端科技成就的美好日子，更重要的是能夠生活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最為融合的地方，大家應該珍惜和把握機會，積極為未來發展。我是這項活動的顧問小組召集人，被楊先生一直對關心年青人和推動科技創新不遺餘力的熱情有所感動。

今接到方正兄囑咐在《二十一世紀》楊先生百歲華誕祝壽專輯中撰文，我覺得我沒有資格談論國家在生物科技方面的發展前景，只能藉此機會感謝他多年來對我和我的工作的支持，更衷心祝賀楊先生繼續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2016年邵逸夫獎頒獎典禮上與楊振寧先生合照（圖片由徐立之提供）

徐立之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與哲學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榮休大學教授，前香港大學校長，香港科學院創院院長。